

一碗面百年情

常有外乡友人问我：“南方不是应以大米为主食吗？你们江南人为何对面条如此痴迷呢？”我知道这是基于“南粉北面”一般性认识带来的问题。江南麦作据说自衣冠南渡而起，尤其是靖康之乱后，宋廷南迁，小麦在南方的种植达到了高潮，自然而然，江南大大小小的城市喜吃面食，面条如杭州片儿川、昆山奥灶面、常熟草油面等等均很有名。常州作为吴语区与其他语区交界处，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、融合，一定会产生非常精彩的餐饮文化，“江南美食之都”名副其实，就连一碗银丝面亦能让人垂涎三尺。

1926年版《武进年鉴》中有一幅很有意思的广告，一位神态悠然自得的先生在面馆吃面，左手擎一瓶酱油，右手举箸撩面，桌上是一碗银丝汤面另加两个浇头，即所谓“过桥”。1948年版《武进调查》载常州城内小吃店分面店、馄饨店、糕团店三种，面店所售有鱼面、肉面、虾仁面、火腿面、鸡鸭面、锅面、炒面，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，特别指出绿杨饭店有银丝面饕客。由此可见，旧时常州人对面条之爱可谓一往情深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婶婶带着年幼的我进城到南大街银丝面馆吃过一碗汤面，这是我与银丝面的初次邂逅，依稀记得面馆大门朝东，堂内面积不大。待一碗面上桌，婶婶讲这是阳春面，其实就是没有浇头的光面。只见嫩黄的鸡汤里卧着洁白的银丝细面，上面漂着些许碧绿的葱花，喝一口汤，觉得前所未有的鲜；再吃一口面，面条虽细却很筋道，来不及细细品尝，一碗光面已偃尔落肚，面汤也是喝得干干净净，只剩一滴。与猪八戒吃人参果未尝出味道不同，当时想着人世间怎么能有这么好吃的面条呢？直至回到家中还一直在回味，古人讲绕梁三日，诚不我欺也。

我出生在武进县鸣凰乡农村，村民在田间劳作，中午回家吃一碗面条果腹是常事，且无须炒菜，比吃米饭少了许多麻烦。儿时吃面较别人家更为便利，因外婆家有一台手摇轧面机，代为周边人家加工面条，只小宽面与窄面两种，而无银丝面面齿。我去轧面无须付加工费，当然面粉须自带，因为外婆家亦不富裕。轧了面条回家，团成多个面团放竹筛中置烈日下曝晒后，可长时间保存。

想吃面条了，取数团面团入开水锅煮熟即可，调料仅盐、酱油、猪油，如恰逢自留地青蒜出产，再撒点碎蒜叶于碗中，那简直就是人间至味。乡下孩子遇到城里鸡汤银丝面，与吃惯的酱油面相比，味道当然如云泥之别，一时惊为天，其实是少吃多怪，这是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幸福而又带点心酸地回忆。

时光荏苒，家乡农村改革开放数十年已成富庶之地，银丝面馆也在常州城乡处处开花，成了人民群众家门口的食堂，近年银丝面馆更是开到了外乡。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变成爱读书且不怎么油腻的中年大叔，因工作原因常需出差，慢慢地，每到一个城市寻觅当地小吃成了一种习惯，特别是面条，如广东竹升面、兰州牛肉面、上海辣肉面、新疆拉条子、诸暨次坞打面、台北牛肉面、香港九记牛腩面、贵阳旺肠面、太合双凤羊肉面……均一一吃过。还有一个习惯，每逢休息日，常约友人一一寻味家乡大大小小的面馆，外地友人来访，我亦常会请吃常州特色小吃银丝面。因吃面吃出了妙趣横生的感觉，经同人鼓动便在《武进日报》上开了一个“老徐说面”的栏目，介绍家乡那些有特色有历史的老面馆，其实是讲述家乡人民勤劳、聪明、执着的匠人精神，所谓“功夫在面外”。

我亦喜欢收藏家乡历史文献资料，曾写过一篇考证文章叫《常州银丝面的前世今生》。银丝面在中国的出现当是近代洋务运动中，机制面开始堂而皇之登上面条舞台，民国时期银丝面已在常州城中大行其道。历史上，苏州、上海、广东等地均有银丝面，史学家遂耀东曾讲苏州面馆在民国时期用银丝面，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流行改用小宽面，再后来仍改回用银丝细面，但全国各地似乎只有常州银丝面声名最为显赫。

长期以来，常州银丝面一代又一代的经营者经年累月、精益求精专注于做好一碗面，难怪后来常州银丝面能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知名小吃。这种“事事争当第一流”的追求，其实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底蕴与精神，从文化层面来讲，常州银丝面百年传承从未断过，人民群众大啖银丝面的幸福感、满足感仍在继续，且行且远，所谓一碗银丝面、百年常州情。

徐晓：常州报业印刷的创始人

几年前，退休报人在一起闲聊，说起常州日报老一代报人，认为有“五虎上将”之说。按年龄排列：钱惕明生于1929年，张一农生于1931年，陈弼生于1932年，徐晓生于1933年，巢云栋生于1934年。如今，“五虎”已有“三虎”离开人世。继张一农、巢云栋之后，3月12日，常州日报印刷厂创始人之一、原副厂长徐晓又离开了我们。徐老享年92岁，已是老寿星，在农村属于丧事喜办的人物。

1980年秋，我跨进报社门槛，徐晓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戴一副金边眼镜，头发梳得乌黑油亮，衣冠楚楚，风度翩翩，说话温文尔雅，待人接物和风细雨。起初，我以为他是正宗的城里人，交往多了便自报家门，他是薛家人，我是新闻人，两地紧密相连，自此我俩见面都直呼“老乡”。

解放初，徐晓是在私营美新印刷厂开始他的印刷生涯的。1957年筹建常州日报印刷厂时，他调入并参与筹建工作，与朱连甫、张兴亚都是常州日报印刷厂的创始人。徐晓在很多场合说：“我们是一串椋树果果，朱连甫厂长是大果果，我是小果果。”

事实的确如此，徐晓是一颗坚实光亮、表里如一、的椋树果果。报社印刷厂除排版和印刷常州日报、常州晚报外，还经营许多业务，如每年召开人大政协会议的文件、表格、代表证等。各区局的内部小报、简报、总结材料，许多企业、商店的标牌也在印刷厂经营，生意十分兴隆。特别是两会文件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、要求高，徐晓作为业务科长，每一道环节都不马虎，做到一丝不苟。为此他常常夜以继日，加班加点，可从从不申报加班费之类。

“常在河边走，就是不湿鞋。”用此句来概括徐晓的一生也名副其实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绿祖国大地，他看到希望，振奋精神，全身心投入“四化”建设的热潮中去。主持着印刷厂热点部门，但他不收礼物，不吃回扣，不要好处，这是他做人处事的底线。

“党叫干啥就干啥。”徐晓曾在报社发行科干过几年。1989年6月常州日报实行自办发行之前，是通过邮局发行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常州日报发行量扶

摇直上，深受市民喜爱，碰到热点报道，零售报纸一报难求。记得有一篇震惊全市的枪击案破案报道引起全市瞩目，读者排长龙抢

购当天日报，先睹为快。发行科和邮局紧密配合，第一时间把报纸送到读者手中。

悼文送给老报人，念念不忘同乡

情。徐氏九秩堪人瑞，晓得成功赖艰辛。这是今年3月12日闻知徐晓仙逝，我打油的一首藏头诗。愿徐老天堂快乐！



20年前重阳节，徐晓和老报人一起游览红梅公园，于红梅阁牌坊石柱前留影。前排左起：王润、陈弼、施培元、徐晓。后排左起：高振洲、张一农。

养猪，一堂免费的市场经济课

我父亲一辈子喜欢养猪，是地方上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他就在本乡八一饲养场养过多年猪，“文革”时期又在本生产队的饲养场养过猪，而且养猪的数量和规模不小。为了维持全家生计，我们家里也一年四季养着猪，常年养一头母猪、两头肉猪，最多时养两头母猪、五头肉猪。

从小就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，我也学会了养猪。1981年4月的一天，我父亲突然去世，家里养母猪的任务就落在了我的肩上。可是，这一年农民养猪普遍不景气，饲料价格上涨，猪肉价格下滑，一些养猪专业户，因养猪亏本，纷纷将自己的母猪宰的宰，卖的卖，养猪在当时成了农民的负担。这时的我，左右为难，还继续养母猪吗？最后，“养”的思想还是占了上风。原因有三：其一，我父亲留下了一头母猪给我，也算是一笔生产资料，我不能枉费父亲的一片心机，应继承父亲的养猪事业，把猪养好；其二，如果农民兄弟都不养猪，大家吃什么？总不能老是青菜萝卜搭饭吧？其三，海水有涨潮落现象，养猪市场也会时起时伏，这是很正常的现象，只要正确把握机遇，养猪肯定会赚钱、致富。

为了节约养猪成本，平时我给母猪吃些粗饲料，如将稻草粉碎后，搭配些青草或青菜给母猪吃，而且是生吃。待母猪怀孕后，我将粗饲料搭配一些精饲料（如大麦、豆饼等）喂猪，这样给母猪增加了营养，使母猪养得膘肥体壮。这一

年的冬天，一窝小猪顺利产出了，一共是11只，其中3只公的，8只雌的。为此，我想方设法，精心饲养。首先，我讲究科学养猪，无论母猪还是小猪，都是生食喂猪，改变传统的熟食喂猪。因为猪饲料经过高温烧熟后，营养会被破坏。猪吃生食后，既长膘，又长肥。我在自留地上种了一分多地的甜菜，甜菜是理想的饲料，它营养成分高。另外，甜菜是剥叶子吃的，一层叶子剥掉，没过几天，又长起来了，真是“层出不穷”。

经过50多天的饲养，小猪要阉割了，我将8头小雌猪繁殖成8头母猪。为何在生猪市场不景气的形势下，我还继续繁殖母猪呢？我当时有自己的小九九：不久前，大家都把母猪宰的宰，卖的卖，市场上的母猪极少。母猪一少，苗猪自然就少，到了1982年春节前后，猪肉突然涨价，一些养猪专业户又会想养猪了。可那时，猪源匮乏，苗猪肯定涨价。果然，地方上的一些养猪能手纷纷向我预定母猪，8头母猪一下子预定了5头。还有3头，我拿到戚墅堰苗猪市场卖掉，而且价格比一般的苗猪要贵一倍（当时苗猪价格是每100斤70到80元）。经过近三个月的饲养，8头母猪共卖出1000多元。1000多元钱在当时农村可以建成一间两层半的楼房。这时的我，虽然奔波东西，忙忙后，但我的心里却是乐滋滋的。这真是：父亲靠养猪维持全家生计，儿子靠养猪奔向小康生活。

养猪对我来说，可以说是一堂免费的市场经济课。

银杏，在我心中就是母校奔牛中学里一棵古老苍劲的参天大树，相传为南宋隆兴年间能仁寺方丈慧远手植，已有800多年了，足够“老”，怀抱一圈要四五个人才行，足够“大”，夏天一树绿叶，秋冬满树金黄，足够“美”。还记得树旁的礼堂门口，黑板上有一条醒目的标语：“头可断、血可流，高考冠军不可丢！”那时的奔牛屡获高考冠军，名震常武。这些在我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。

当然，更令人难忘的是那些老师，教务主任卓卓雄，班主任、俄语老师陈文英，语文老师张祖光、纪益农，数学老师沈广林、王铿，物理老师李作模、贾志鹏，化学老师王国璋、叶青兰……他们教学认真严谨，不仅帮我们打下了坚实的文化知识基础，也指导我们正确走上人生之路。记得一次化学作业发下来后，王国璋老师给我批了两个字：“重做！”我心里嘀咕，“不就是两个小错误，用得着重做吗”，但还是重做了。再发下来还是两个字：“重做！”我仔细一看，还有两个箭头标错了。直到现在，我还记得王国璋老师那刚劲有力的“重做”两个字以及大大的感叹号。两次“重做”等于两记重重的敲打！老师的严谨教风直接影响了，使我逐步养成了严谨的学风。还有李作模老师专家学者的教学、纪益农老师生动活泼的语文课、沈广林老师数学课上形象幽默的语言……这个教师团队可以说是十分棒的。

我心中的银杏

要说棒的，还有我们班上那些兄弟般的同学：班长刘正范，团书记童如林、潘培康、彭华良、王瑞新、丁学东、殷湘荣、何仁江……班长刘正范多才多艺，拉得一手好二胡。记得开学不久，在学校的文艺晚会上，刘正范登台演出二胡独奏曲《山村变了样》。那是我第一次听二胡独奏，也是我学习二胡的起点。我是站在后排凳子上听他演奏的。娴熟的技艺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，也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。从此，他也成了我的二胡老师。夏天，我们常在银杏树下练习，那情那景，如诗如画，终生难忘。

毕业以后，银杏在我心中是一种思念。高中毕业后，因为“文化大革命”，高考停止了，同学们各奔东西。我回乡后先做了一年农民，后来做了几年赤脚医生，还当了几年代课教师，当了几年公社文化站站长。1977年，改革的春风吹拂神州大地，中央决定恢复高考。那时，我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父亲了，但考虑再三，还是决定报名参加高考。第一年恢复高考，有初试和复试。据说，我们公社33个文科考生，仅我一人通过初试。高考复试考场设在奔牛中学。母校的老师对我大力支持。季洪金老师把自己的宿舍让出来给我休息，高炳芳老师帮助我梳理地理知识。考试就在我读高三时的教室举行，窗外看得见学校的银杏树，她成了我参加高考的见证人。复试比较顺利，两个

半小时的语文考试，我两个小时就完成了。高考发榜，我被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。两个小孩的父亲考上大学，乡亲们奔走相告，一时传为美谈。大学毕业后，我留校任教，但我同母校奔牛中学保持着联系，只要一回到奔牛中学，总要去看看学校的老师，忘不了去看看银杏树。

现在，银杏在我心中是一种文化。2012年，奔牛中学易地新建，学校搬到了大运河边的南观路2号。新学校是一所现代化学校，教学建筑、学校设施、教学环境在常州地区数一数二，但那棵银杏树怎么办？搬走，不可能；不搬，是一个很大的缺憾。校长王奕飞对此有独特的思考和创意。他考虑，“银杏”已成为学校特有的文化元素，在学校易地新建过程中，为了能很好传承老校区历史文化，邀请著名画家创作春夏秋冬“四季银杏”写生画，挂在新校区树人楼大厅里。我看到这四幅画不同凡响，这个创意太好了！学校的校徽也别有创意，据说是一位同学设计的。主标志由古银杏树的一片叶子组成，银杏叶嵌入圆形中，简洁大方，象征着奔牛中学深厚的文化底蕴。浅绿色的半瓣银杏叶犹如翻开的新书页，环绕的圆形象征着悠悠古运河，寓意奔牛新的征程和美好的明天。深绿与浅绿交相辉映，象征着古老银杏上发出的新芽，富有诗意，充满生命力。

说到奔牛中学的文化，我印象颇深的是原来东面紧挨着学校的围墙

有一条小河，那河同成语“高山流水”有关。据有关史料，学校东面的小河叫伯牙溪，伯牙溪西有大悲庵。我们读书的时候，大悲庵还在。这是风水宝地啊！成语“高山流水”故事的遗存，全国有好几处，但最浪漫的要数奔牛中学旁边的伯牙溪。溪中的“琴鱼”据说是俞伯牙摔琴后的琴片变成的，这同梁祝故事中的“化蝶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奔牛中学易地重建后新建了知音亭，小桥流水，十分雅致，可谓文化传承，把知音文化发扬光大。

其实，学校不仅有“高山流水”的成语故事，而且同中华成语文化有缘。记得2011年，学校要申报省级课程基地，时任副校长王冬虎竭力建议校长谢建伟建设成语文化课程基地。说来真的有缘。王冬虎与我是南师大校友。他提出建议后，谢建伟校长组织了反复论证，决定上报成语文化课程基地并获成功。现在，走进省奔中，成语文化之花遍地绽放：有大气典雅的研习中心，有别具一格的成语广场，有传统风格的成语长廊，有自成体系的校本教材，还有“高山流水”的知音亭……奔牛中学的成语文化已经成为学校的特色文化，成为一张靓丽名片。

走进奔牛中学老校区，饱经风霜的银杏树依然苍劲挺拔；跨进新校园，四幅银杏图展示银杏四季的风采。银杏，在奔牛中学已经成为一种品格、一种精神、一种文化。每当我们再回母校，总要带着虔诚，带着敬意多看一眼银杏树。